获得新知。  
　　我们习惯了从文字中寻觅、发现、认识历史。这其实是存在局限的，任何文字作品，都凝结着作者的记忆、观察、分析，以及他的理想、追求，而偶然进入地下又偶然重现在人间的考古遗存、文物碎片，它们零散、无序，不以彰显自身为目的，才是古代社会生活中存在过的细节。古代新疆，古文献记录是相对较少的。因此，考古文物在认识、揭示人类历史进程的细节时，具有更加不同一般的价值。  
　　在新疆拜城县北境，天山博者克拉格沟口西侧岩壁，还依稀可见东汉时期一方摩崖刻石。汉隶书就的刻石，保留了时在龟兹任左将军的刘平国于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率领“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在沟口建“东乌垒关城”的史迹。龟兹（今库车地区）北向天山，穿越天山峡谷，通达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是汉代通向乌孙的重要通道。刘平国率孟伯山等六人于当年“七月二十六日发家，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廿日”，建成关亭，于是刻石纪念，为今人保留下了很罕见的历史细节。  
　　文字极简，但信息丰富。汉武帝刘彻开拓西域，西汉王朝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号令西域大地。至东汉永寿四年，新疆进入祖国政治版图已有217个年头。但居住在今库车境内的孟伯山、程阿羌等，包括基层官员刘平国，竟然还十分传统地称自己为“秦人”！  
　　秦王朝雄立在东亚大地，短短不足20年。但秦国，从西周末叶起已经在祖国西部大地经营、开拓多年，文字记录中不算多，但考古中却见不少端倪。新疆大地居民在入汉两个多世纪后，仍自称为“秦人”，就足显秦国曾经产生过的经济、文化影响。伊朗、印度、阿富汗至今仍称中国为“秦”，这不是偶然的历史文化现象。这影响，自然不是耸立不足20年的秦王朝所营造成功的，这“秦”字背后，断断少不了秦始皇以前的秦国的积累，秦人在西部世界曾经散射、留存的经济文化精神，浸透、保留在历史的血脉中，深蕴在人民的记忆里。  
　　秦王朝二世而亡。秦亡后，新起的汉王朝在消弭秦文化影响上，没有少下功夫。《史记》中不少地方，如《大宛列传》记中亚费尔干纳等处城邦，就称东部华夏居民为“秦人”，入《汉书》，相关史文中的“秦人”就都改成了“汉人”。可见，汉代真是曾经十分努力进行过清除秦朝政治影响的文化工程。但“秦”在很长时段内已经铸就的对西部世界的影响，不是短时段内的行政努力就可以完全清除的。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文化现象。  
　　文献中的记录可以清除，但民间曾经实际存在，尤其是已经沉没在地下的文物，却不可能消失无踪。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少。1976年，笔者在天山阿拉沟峡谷发掘过一批战国时期古冢，就曾出土过具有战国时段楚文化风格的刺绣、绫文罗、山字纹青铜镜和多件漆器；在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墓中，出土过具有秦式风格的茧形陶壶；在阿勒泰山南麓克尔木齐古墓中，出土过具有先秦风格的素面圆形小铜镜……这些只不过是我个人在新疆考古中接触过的先秦文物，有幸入目的这些先秦文物，较之仍然沉落在地下的先秦历史碎片，逻辑推论自然只能是少之又少、难成比例的。  
　　新疆以远，在俄罗斯属阿勒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古冢中，也曾经出土过与天山阿拉沟古冢风格相类的文物，这早已是研究欧亚文明史的历史学界熟知的存在。只是巴泽雷克文物时代较阿拉沟要早，它们是与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伊朗文物共存于一墓之中的。凡此种种，可以透见：秦王朝的先祖，僻处袓国西部的秦王国，其经济文化影响力曾远及西部世界，是一个可以肯定的历史事实。张骞“凿空”，是2000多年前西汉王朝政府向世界的宣示：备历艰辛的张骞，完成了汉王朝政府联系中亚西部世界城邦、王国的使命，西汉王朝已成功开始了与西部世界的交往，揭开了历史的新页，但同样可以肯定，早在西汉以前，在秦朝、秦王国时段，秦与西部世界的交往，已是现实的存在。  
　　作为祖国的西部边疆，自公元前59年进入祖国政治版图，迄今已经2177个春秋。自2100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以如椽大笔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写下这片土地，历代王朝史家，在国史著作中都会专设《西域传》，述说西部边疆的相关史实。在考古人手铲下现身的文物碎片，不仅可以与文字记录互证、互补，尤其可以多见正史少见著录的普通社会人民的生活情状，触摸到他们的欢乐与忧伤。笔者有幸，在北大受到5年基本考古知识培训后即来到新疆考古，不知不觉间在这片土地上已经踯躅了57个年头，这57个年头中目验、手触过的文物，无一不见证着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开拓建设这片土地的历史。  
　　王炳华，江苏南通人，1935年生。1960年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即赴新疆，从事考古工作。曾长期担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两次获新疆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退休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语言研究所特聘教授。  
　　长期以来，长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视为中国的标志与和平的象征，并被赋予崇高的精神价值。其无与伦比的规模和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的壮丽形象，使每个见到它的人，都受到强烈的视觉刺激，心灵受到无比震撼。  
　　长城的军事功能不言而喻，但烽火远去后的长城与当代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除了疆场，更是实实在在的家园  
　　当我们观察长城分布图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长城的走向与丝绸之路几乎是平行的。我们不禁联想，这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比如河西走廊。这条中原通往中亚的孔道，原本不是中国传统疆域，而是被大月氏所控制，后来又为匈奴占据。公元前2世纪中叶，中国与匈奴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汉朝驱逐了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力，将这一带纳入版图。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控制了西域。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中亚的道路最终得以贯通。而河西走廊与西域地区的长城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修建。因此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那就是汉代西北地区长城的修建，以控制河西走廊为目的，至少是将其作为重要目的之一。客观上，这一举措也就保护了丝绸之路的贸易。  
　　事实上，长城本身也直接承担经济功能。2000多年来，长城内外的关系曾有过相当长的缓和时期。在和平年代，长城两侧的人民在长城沿线开展贸易。一些关隘和城堡逐渐成为固定贸易场所，甚至在后来发展成国际贸易口岸，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在这些军事要塞定居生活。  
　　位于北京西北部约200千米的张家口，是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明代的小城堡，在18世纪曾云集1700余个商号，陆续吸引蒙古、俄罗斯、德国的客商，是非常繁荣的都市。  
　　再看张家口市地图，我曾仔细对照明清时期关于张家口地区的各种方志，发现当代张家口市辖17个区县内所有地图上显示的地名，几乎全部是明长城的组成部分。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长城沿线关隘和城堡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废弃成为遗址，或开发为景区，绝大多数发展演变成为现代城镇或乡村。据统计，长城沿线2200多个关堡中有超过1000个像张家口这样发展成为现代城镇。  
　　长城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不仅是名胜古迹或精神象征，也是实实在在的家园。我们曾经对长城沿线居民进行采访，发现这些居民中还有很多人是长城守军的后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成为长城景观的一部分。  
　　东西方对长城的解读不同  
　　长城无疑是最为知名的世界遗产，然而，它的名气却影响了我们对它的客观认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对长城的形象多少都有一点“善意的扭曲”，而这种扭曲往往都与观念产生时期的宏观历史背景相联系。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时间轴，观察对于长城的各种观念是何时产生的。首先谈古代中国人，实际上中国人一直以来并不喜欢长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直接或明显地与具有突出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相关”是长城的“突出普遍价值”之一。  
　　孟姜女的故事折射的是人民对于沉重劳役和残酷统治的强烈不满。再如，在中国的诗歌体系中有一个类别“边塞诗”，正是来自于对戍守长城的描绘。我们能够找到数百首描写长城的诗歌，但其中几乎没有一首是赞美它的。“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字里行间透露出戍边生活的艰苦和连年征战的凄惨。此后与长城有关的诗歌基本持相同观点。20世纪前，中国人对长城普遍持这样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对长城最早的正面描述，并不是来自中国，而是西方。在17—18世纪的欧洲文献中，我们能够查阅到很多关于长城的夸张描述。比如费迪南·维比斯特（1623—1688）曾说，“世界七大奇迹放在一起，也抵不过（长城）这项工程。欧洲人当中流传的所有有关它的名声相比我亲眼所见的，相去甚远。”  
　　长城还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影响。伏尔泰（1694—1774）在《风俗论》和《哲学词典》中将长城称为“一桩伟大的工程”，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书信》中第一次将其称之为丰碑。  
　　在精神领域，长城第一次具有了世界意义。然而，到1793年，当英国的马戛尔尼爵士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来到中国，并称赞长城之时，中国人却依然不理解这些“蛮夷”对长城的热情。西方人对长城的夸张观念的影响持续到当代。1987年，长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突出普遍价值”评语中，我们仍然读到“长城是唯一能在月球上看到的人工建筑”。  
　　东西方对长城的看法有如此强烈的反差，主要是因为彼此解读长城的背景和目的有根本区别。中国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受汉代以来儒家思想“节省民力”思想的影响，以及后世王朝对秦朝暴虐形象的刻意塑造，有意将长城宣传成为一个负面的东西。而西方人的赞美，多是来自于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对神秘东方的向往，对思想解放的理论准备，对未知的憧憬，对秩序的追求。  
　　实际上，关于长城的理性声音也出现在17世纪前后。1644年，明朝灭亡。一些曾经参与反抗新王朝斗争的人士在失败之后转而开始关注边疆历史地理，考证长城的走向、关口等，进而检讨旧王朝的边防政策。  
　　19世纪末，西方人用工业文明成果敲开中国的大门，并发现那个曾让他们向往的中国是如此贫弱不堪。失望之余，他们对长城的热情也开始转变为理性研究和实地考察。斯坦因来华正是在这个时期。与此同时，中国人对长城的观念却因新的边疆危机而发生相反的转变。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长城誉为“世界奇观”，这说明中国人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长城的印象已经改变。而到了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加剧，长城沿线发生了一系列战斗，长城迅速转型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毛泽东“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词更是家喻户晓。80年代提出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也是深入人心。  
　　与长城在全球范围内的受关注度相比，公众对长城的知识却少得可怜。一份2014年的调查显示，长城沿线的居民中，仅有40%的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长城，知名度与知识的极度不平衡，也成为当前长城认知的一个突出现象。  
　　长城不仅是屏障，更是纽带；它是当时科技的集成，也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长城的功能之多样，价值之多元，远超现代人的想象。对长城不同价值的思考决定了长城不同的保护模式与展示方法。2006年国务院制定了《长城保护条例》，十多年的时间中，对长城的保护已经融入今天很多人的生活。2018年，《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将发布，绵延万里的长城将陪伴着我们走向未来。  
　　制图：沈亦伶  
　　少在乡下，读书甚勤，夜修晚归，一近“柴门”便“闻犬吠”，慈母守候，闻声迎归。心存高志，犬吠鸡鸣，唤醒早读，晨光熹微，余将狗阿黄、鸡阿花幻想为黄犬、苍鹰，吟诵“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以自勉。现在每日为国家“效犬马之劳”，梦里依稀桃花源，“鸡犬之声相闻”……  
　　不妨先讲讲“犬马之劳”的来由。这些年，我们在陕西、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发现的数十处先秦时期的车马坑中，都发现出土家犬的现象，不少家犬颈部系铜铃。以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为例，狗是车马坑中不可或缺的随葬品。一般以1车2马或4马配1狗的组合出现，这些在当时战争中形成的车马狗组合。大概就是“效犬马之劳”的来由。  
　　狗卓然迥异于“六畜”等其他的家养动物，它是世界上最早被驯化的动物，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了多种角色；人类与狗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亲密关系，凡人类的地方即有狗的存在。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史就是人类“与狗同行”的历史。  
　　狗尽管形态各异，但只有一个共同的野生祖先灰狼。中国是狗的驯化起源中心之一。2009年，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学院认为狗最初被驯化是在距今1.6万年前的中国南方地区；2016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则认为狗是在约3.3万年前开始在东亚的南部地区逐渐被人类所驯化的，并在距今1.5万年后向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迁徙扩散。两项研究在“中国南方地区是狗的起源中心之一”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是，起源时间上的巨大差距暴露了他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没有动物遗存这个“实锤”证据，现生动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探讨驯化动物起源上就会存在局限。立足于考古学证据，中国动物考古学家袁靖认为：中国最早的狗出土于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时间为距今1万年前，其主要证据是骨骼形态和测量数据与狼差异明显、而与狗相似，这是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境内狗的起源时间和地点的较为可信的结论。  
　　所谓动物驯化，是指人类社会出于物质、社会或象征的目的，控制动物的同类群再繁殖的过程。人类和驯化动物之间存在互利共生关系：“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就是我们的选择”。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宠物，古人对狗的利用仍是基于其实际用途，《礼记·少仪》云：“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孔颖达疏：“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  
　　在古代的画像石和绘画中，都有猎犬帮助古人狩猎的场景。狗的最主要驯化动因可能是作为人类狩猎助手。农业萌发促使狩猎方式逐渐退居历史舞台一隅，但猎犬在狩猎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东周时期，猎犬的实际用途发生改变，成为直接参与战斗或警戒守营的“战斗犬”或“警犬”，墓葬中车马狗的组合是其在战争中作用的反映。诸侯国还设有“犬营”，名曰“狗附”；此外，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兴起，猎犬也成为随牧人放牧的“牧羊犬”，新疆阿尔泰哈巴河县发现的放牧图中即有牧羊犬的形象。  
　　河南舞阳贾湖发遗址发现有11条狗被分别埋葬在居住地和墓地里，表明狗在距今9000年前已用作祭牲，揭示了人类与狗之间历史悠久的密切关系。墓葬中随葬狗牲的考古现象最早见于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后成为商文化较为常见的一种葬俗，尤以晚商时期最为流行，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犬祭，并出现专门掌管祭祀用犬的职官（殷墟卜辞中有“犬中”“多犬”等记载），狗在当时居祭牲之首，犬牲的大量使用因而促进了养犬业的规模化。周代，随着祭牲礼制化的确立，狗位居“五牲”之一，“序五牲之先后贵贱”用以构建阶级或阶层的区分，河南洛阳西工131号墓内用五鼎随葬，鼎内分别装有牛、羊、猪、狗和鸡等“五牲”。  
　　科学家对银狐所进行的现代驯化实验表明：只有那些攻击性小（温顺）的个体才能够被驯服，因此，人类的选育在由狼向狗转化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从而造成“狼子野心”的关键基因在狗身上荡然无存。距今7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南北方狗的体形大小即已产生差异（北方稍大、南方稍小）；商代以后，各地狗的体形大小更趋复杂，表明狗的品种进一步分化；及至汉代，狗的选育已有章可循，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有《相狗经》残简。直至19世纪初，狗才被大量有选择性地育种作为宠物，自此，狗的品种迅猛增加，据称目前世界上的家犬品种已达400多种，而中国约有30余种。  
　　狗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狗爪印”。未来之路依旧延伸，狗将与人类继续并肩前行。  
　　“磨镜”即磨拭铜镜，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职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被称为“磨镜客”或“磨镜匠”，有点类似于近现代走街串巷、吆喝着“磨剪子嘞抢菜刀”的磨刀人。古时，铜镜需要常磨才能照影。也许自从有了铜镜之后，就逐渐产生了磨镜客。  
　　在汉代文献中，有关磨镜的记述较少，但磨镜的典故却流传甚广，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趣事。磨镜的具体方法，目前最早的文献见于西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刚从模子里铸出来的镜面很模糊，照不出身影容貌；要用玄锡摩擦，再用毛毡用力擦拭之后，人的两鬓、眉毛、毫毛都能在镜中清晰可见。铜镜用得时间长了，会变得昏暗无光，古人称之为“昏镜”，需要重新磨拭才能使用。托名西汉刘向撰《列仙传》中的负局先生，是一位仙风道骨、充满传奇色彩的磨镜客。“负局”就是背着像博具一样的方形平板状磨镜器具。磨镜时，将昏镜镜面放置于平板之上，先将镜面清理干净，再涂以磨镜药，加以磨拭，直至光亮如新。负局先生也不知是何方人氏，听口音像是北方燕代之间的人。他经常背着磨镜器具，给人磨拭昏镜，只收一枚铜钱的费用。他看似以磨镜为业，实则为患者送药治病，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名字的磨镜客。“负局”作为磨镜的代名词，成为后世诗文中经常引用的典故，磨镜客亦称“负局人”“负局仙”。  
　　1971年，陕西乾县唐代章怀太子墓出土一面太子妃房氏生前使用的铜镜，镜背内区四面配以青龙、麒麟、鸾凤等珍禽瑞兽，外饰“鉴若止水，光如电耀；仙客来磨，灵妃往照”等一周反书阳文。铭文中所说“仙客来磨”，应是指负局先生之类的仙人扮成磨镜客，来到世间为人磨镜。  
　　与汉唐时期相比，元明清史料中有关磨镜的记载更为详细。有一部传为明代刘基撰《多能鄙事》的书，记录了三条有关磨镜及磨镜药的秘方。第一条是磨古镜，用猪、羊、犬、龟、熊五种动物的胆，先阴干，合和为粉末；再用水湿镜，掺药粉于其上；将镜面翻过来，面向地，不用磨镜，自然就会重见明亮。第二条也是关于磨镜的方子，用鹿顶骨（烧灰）、白矾（枯）、银母砂（对母者，或四六者，亦可等分），研为细粉末，和匀；在铜镜磨拭干净之后，再以此粉末磨镜，使镜面出现光明；用此药磨镜一次，可保持一两年。第三条是有关磨镜药的配制，主要原料为白矾六钱、水银一钱、白铁（即锡）一钱、鹿角灰一钱；先用水银将白铁与沙子细磨如泥，淘洗白净，加入鹿角灰及矾，研磨极细才可使用。  
　　除了历史文献记述与磨镜相关的史料之外，目前还能够见到一些明清时期画家绘制的《磨镜图》，为今人了解和认识这个古老的职业，提供了清晰的图像资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幅清代《磨镜图》，画面上共计五人，左侧四人为顾客，右侧一人为磨镜客。磨镜老汉坐于木条凳后端，前端放镜，左脚踩着一条绳子，是为了固定正在磨的铜镜；双手握毡团，在镜面上摩擦。条凳内侧放置一个圆筒，顶部可见装有磨镜药的罐、瓶等器皿。画面左侧四人，坐者与立者各有两人。前坐一老翁、一老妇，神情专注地看着磨镜。后立两少妇，一位揽镜自照，镜中容貌自见；另一位怀抱一面大铜镜，望着照镜女子。  
　　1925年2月9日，鲁迅在《看镜有感》一文中对民国时期难得一见的磨镜老翁做了生动描写：“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逐了。然而也还有余烈可寻，倘街头遇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东西，上面缚着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喊，就是‘磨镜，磨剪刀！’”由此看来，清代后期，随着西方玻璃镜的大量涌入，中国古老的铜镜在不知不觉中被取而代之。从已知的西汉早期到清代晚期，磨镜这个与普通百姓生活最为贴近的行当历经近两千年，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陕北高原年味浓，家家户户贴上红色的春联、炸起金黄的年糕，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彻山山峁峁。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如今，离开梁家河40多年了，他依然能一见面就叫出乡亲们的小名——随娃、黑子、铁锁……回忆起和总书记交往的点点滴滴，乡亲们说：“近平从来没有忘了我们，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重情重义”，记者循着总书记的足迹采访下来，在他当年读书的校园、在他当年插队的村子、在他当年工作的县城、在他考察调研过的地方，甚至走出国门，都频频听到这个词。这位“黄土地的儿子”，心里不仅装着梁家河的父老，也始终惦念着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的乡亲。  
　　梁家河村民石春阳——  
　　“他总是办群众最需要的事”  
　　【7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和梁家河村民石春阳结下了深厚友谊。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又担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他说，总书记留下的无价财富里，有一份财富叫“情义”。】  
　　“乡亲们和他可亲啦，常会念起他。”石春阳端坐沙发，身后墙上挂着总书记2015年2月来梁家河时的几幅照片，炕头烧得热乎，水在炉上沸腾，小猫在脚边依偎。  
　　窗外，正经历着千百年来的沧桑巨变。  
　　1969年1月，下乡知青习近平来到陕北革命老区，来到这个小山村。那时的陕北，家家住在土窑洞，面朝黄土背朝天。“习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就给贫穷的村子带来了生机。”他带领村民修了陕西第一座沼气池，打了灌溉井，办了铁业社、缝纫社、代销店、磨坊……“至今村口最大一块淤地坝，还是近平当年带着我们整的。”  
　　石春阳说，总书记给村里留下的设施今天还在用。他总是办群众最需要的事，还留下了一份40多年的情义，暖了全村人的心。  
　　“近平把情义看得像山一样重。”石春阳说。村民吕侯生的腿因为修窑洞被砸了，习近平收到信，随信寄去500元钱路费，接吕侯生到福建去治病。“不仅救了他一条腿，也救了他一个家。”习近平当年和村民张卫庞一个大锅里吃饭，临走前送给他一个自己十分珍视、绣着“娘的心”的针线包。“2015年2月，近平回梁家河时听说张卫庞种果树，还专门去了一趟山上果园看他。”  
　　1975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村支书的担子压到了石春阳的肩上。“每次见面或写信，近平都会询问村里的近况，村里的发展，他始终惦记着，心里有本账。”这些年，土路变成了柏油路、煤油灯变成了电灯、糠团子变成了白面馍馍、窑洞变成了楼房……说起梁家河变化，石春阳喜不自禁，他家的窑洞也挂上了“春阳农家院”的门牌：“梁家河现在名气响了，办起了不少农家乐，果树也创出了品牌，村民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贾大山之子贾永辉——  
　　“他紧握我父亲的手流下了泪水”  
　　【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期间，习近平遇到一位“好朋友、好兄长”——作家贾大山，工作之余两人经常促膝长谈。离开正定后，贾大山患病，习近平多次探望。贾大山去世后，习近平撰写《忆大山》一文，深情回忆交往中的感人细节。】  
　　“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  
　　20年来，《忆大山》一文，贾大山之子贾永辉含泪读了无数遍，每一个字句都能背出来。父亲生前的朋友里，这位常来家里聊天的“书记叔叔”，让他印象最深也最感动。  
　　1982年早春，习近平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那时候，贾大山在县文化馆工作。第一次见面临别时，贾大山拉着习近平的手久久不愿放开：“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坐坐。”  
　　“此后几年里，有时‘书记叔叔’到我家来，有时父亲到他那儿去。第二天总会听父亲说起，昨晚又和叔叔聊到了凌晨。”贾永辉童年记忆里，书记叔叔习近平“每次一个人步行前来，一点领导架子都没有”，“冬天总是一身褪了色的衣裳”。  
　　“父亲说起习叔叔，常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夸他有思路，敢负责，为正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在我们全家眼里，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好领导。”贾永辉说。1996年，贾大山病重，到北京住院治疗。习近平趁在北京学习的机会抽空去探病。“病床上的父亲看到习叔叔，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快过年时，贾大山出院回到正定。“正月初三，没想到习叔叔又专程到家里看望父亲。他紧握我父亲的手流下了泪水。那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10多天后父亲就去世了。”  
　　每每忆起习近平和父亲的友谊，贾永辉总是既感动又崇敬：“习叔叔说父亲是他‘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从他们两人的友情延续中，我看到了党和群众的骨肉深情，看到了党的领袖的高尚品德和人性光辉。”  
　　八一学校退休教师陈仲韩——  
　　“他能记住每一位老师的名字”  
　　【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期间，陈仲韩担任他的副班主任。离开校园至今，习近平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始终惦念着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们。陈仲韩老师感叹：“他的感恩之情不仅浓厚而且持久，师生情谊一直在他心中。”】  
　　2016年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走进北京市八一学校的大门，琅琅书声唤回了年少时的记忆。在学校，他见到当年教过自己的几位老师。陈仲韩深情回忆说：“教书那会我们正青春，如